

# “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 ——基于多期DID模型的经验分析

刘斌 邹恬华 张涵\*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有助于实现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文章使用2009—2018年UN Comtrade产品级别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该结论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同时,文章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同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经济机制与提升文化认同的文化机制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产生影响。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集中于文化消费品而非文化收藏品。文章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产品出口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文化产品 多期双重差分

**DOI:**10.19592/j.cnki.scje.400616

**JEL分类号:**F13,F14,F15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23)07-135-18

## 一、引言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势头极为迅猛。根据中国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报告,2021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为1392.5亿美元,相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420.5亿美元,同比增长43.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然而与此相对的是,文化产品贸易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现阶段学界对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主要基于引力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Marvasti, 1994; White, 2008; Disdier et al., 2010; Tadesse and White, 2010),这些研究扩充了引力模型的理论框架。但基于国家特征,尤其是基于不可改变的地理特征的研究较难对国家政策提供直接的评估。也有部分学者尝试探讨政策与文化产品贸易的关联,但他们多从全球治理视角探讨文化产品是否应当适用不同的区域贸易规则(Galperin, 1999; Footer and Graber, 2000; Hahn, 2006),而评估具体某一促进政策对文化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则凤毛麟角。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之一即为“深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这为本文检验国家战略对文

\*刘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国WTO研究院,E-mail:liubin@uibe.edu.cn,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邮编:100029;邹恬华(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E-mail:zoutianhua@ruc.edu.cn;张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E-mail:h Zhang45234@outlook.com。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的WTO改革研究”(21JZD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开放、国内运输成本与南北经济差距”(721730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2年度课程思政研究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全球经济治理课程建设研究”(74223301)、世界贸易组织教育项目(WCP)资助。

化产品贸易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机会。由于学界关于文化产品进口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未达成统一观点(Francois and Ypersele, 2002; Ferreira and Waldfogel, 2013; Li and Yang, 2020), 本文选择检验文化产品出口部门受国家战略的影响。数据方面, 本文使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贸易出口额数据, 采用HS码匹配方式获取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研究方法方面, 本文参考Beck et al.(2010)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在处理组与对照组的选择上, 考虑到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及效果可能存在的滞后性, 本文选择“中国一带一路网”<sup>①</sup>上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每个贸易伙伴的签署年份(以新闻报导时间计, 截至2018年)的滞后两年作为基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贸易伙伴在基年及之后年份作为处理组, 其他样本作为对照组。本文参考曲如晓等(2015)选取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这是因为非核心文化产品大多为国际分工下的产物, 不能较好地体现文化竞争力<sup>②</sup>。本文基本结论为: 在总量上,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扩大文化产品出口; 在文化产品类别上, “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消费品具有最强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同时通过经济机制与文化机制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产生影响。

相比于现有文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方面, 本文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以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性。以往文献多以是否在2013年之后、地理上是否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作为处理组选择的标准, 而忽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然而, 倡议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没有空间边界的开放合作网络(Liu and Dunford, 2016)。因此本文不囿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与是否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而是将不同时期、所有签署合作协议的贸易伙伴均纳入研究范围。对于签署合作协议时点不一致的问题, 本文引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解决。第二, 在分析方法选择方面, 本文采用了更为合适的计量模型以保留更为全面的数据。现阶段学者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多基于引力模型及其发展模型, 因此受限于Hofstede(2011)的文化距离数据, 观测值限于81个国家和地区。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并在模型中考虑了固定效应, 文化差异这一截面因素已被固定效应吸收, 因而本文可以将样本扩大至UN Comtrade全部国家和地区。同时, 本文数据精确到HS码级别, 大大扩展了样本容量, 有助于获得更为全面准确的分析结果。最后, 在拓展分析方面,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核心文化产品的影响效应在产品类型、贸易伙伴特征等层面上的异质性, 以期得到更具有针对性的结论。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为: 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为理论机制; 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与数据; 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 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一类文献为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部分学者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认为在传统的引力模型基础上, 国内市场规模、移民关系、共同的语言、历史殖民联系、文化距离、贸易伙伴平均受教育程度也是文化产品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地, Marvasti(1994)发

<sup>①</sup> “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

<sup>②</sup> 事实上, 在本文中“文化产品”与“核心文化产品”具有相同的内涵, 它们均指“具有文化内涵的贸易产品”。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 “文化产品”是一个抽象概念, “核心文化产品”是在实证检验中的一个具体指标。

现国内市场规模是电影和唱片行业净出口的重要决定因素;White(2008)认为移民关系能部分抵消文化距离带来的影响,从而促进移民国与移民母国间的贸易;Disdier et al.(2010)认为共同的语言、历史殖民联系会影响文化产品贸易,并指出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成瘾性”;Tadesse and White(2010)认为文化距离会阻碍出口。Dong and Truong(2020)在引力模型框架下对越南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规模、市场发展程度、贸易伙伴平均受教育水平对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正向影响。此外,也有学者探讨了贸易政策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及是否应当针对文化产品进行贸易保护。Matheny(1998)认为文化产品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本国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文化产品不应该适用自由贸易的原则,建议世贸组织为各国文化政策创造一个安全的避风港。Galperin(1999)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进行案例研究,探讨了不同情况下区域贸易协定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Footer and Graber(2000)回顾了现有贸易政策与国际争端,并建议将文化产品作为国际贸易的例外。Hahn(2006)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自由贸易规则与文化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部分学者从理论角度探讨了文化产品的出口现状与解决方法。王建平(2014)使用VAR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文化产业的海外投资对于文化产业的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探讨文化冲突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曲如晓等(2015)从二元边际视角出发,发现文化差异主要影响拓展边际而非集约边际。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文献是评估某一事件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施炳展(2016)以韩剧热播为背景检验了文化认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文化认同有助于提升贸易增长速度,该促进效应对差异化的产品尤为显著。韦永贵、张艺川(2021)认为跨国文化传播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综上,尽管上述文献从诸多角度丰富了文化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架构,在普适层面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针对衡量特定事件冲击影响的研究仍较少。本文则尝试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建立评估特定事件冲击对文化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框架。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另一部分文献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与贸易的研究。多数研究从事前角度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徐梁(2016)计算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 指数)与贸易互补指数(Trade Complementary Index),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况进行分析,为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李敬等(2017)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集中化趋势明显。李兵、颜晓晨(2018)则从公共安全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引力模型为基础论证了恐怖袭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影响较小。姚星等(2019)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融合程度,认为产业融合程度呈增长姿态。部分文献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况,为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方向性的建议。张会清、唐海燕(2017)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范兆斌、黄淑娟(2017)则具体到文化产品贸易领域,评估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效率的影响,认为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倒U型特征。部分文献从事后角度使用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孙楚仁等(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异质性产品、非邻国、“一路”国家的出口影响尤为显著。卢盛峰等(2021)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出口质量的影响。邱雪情等(2021)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GVC)攀升,该效应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综上,上述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与贸易的研究事前分析多、事后评估少;对于贸易总体的研究多,针对特定贸易领域的研究少,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能的研究空间。

此外,也有文献分析了与贸易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如对外直接投资、跨境进入模式、企业经营。杨连星等(2016)认为友好双边政策关系有助于提升对外投资规模、投资多元化程度与投资成功率,其中友好城市交流影响尤其显著。张述存(2017)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布局的特征,建议未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型、资源合作型投资。蒋冠宏(2017)运用多类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t)模型,研究了中国企业异质性的最优进入策略。方慧、赵甜(2017)发现国家距离对国际化经营整体呈现抑制作用,其中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技术距离对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吕越等(2019)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绿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部分发现倡议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和与中国临近国家的促进增长效应较为显著,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行业。王桂军、卢潇潇(2019)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徐思等(2019)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缓解受到倡议支持企业的融资约束,该效应对新兴优势行业、外向型节点城市的企业尤为显著。王雄元、卜落凡(2019)认为“中欧班列”开通这一事件通过提升出口贸易促进了企业创新。李建军、李俊成(2020)使用双重差分法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扩大了相关企业的信贷融资规模,该增进效应在外向型节点城市、商贸服务产业以及大型企业中更为突出。此类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框架提供了有益参考。

### 三、理论机制

贸易成本是新新贸易理论中的重要概念(Obstfeld and Rogoff, 2000),包括固定贸易成本与可变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此外,文化产品所特有的文化属性也使得其出口额对于文化差异较为敏感(Tadesse and White, 2010),因此提升文化认同对文化产品出口也有促进作用。本文从以上两个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产品出口促进作用可能的机制。

#### (一)降低贸易成本

固定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出口存在一个“门槛”,只有生产率较高的公司才能进入出口市场(Melitz, 2003)。降低固定贸易成本的举措有助于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首先,信息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岳云嵩等, 2016),通信网络的建设有助于增进买卖双方的连结、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信息搜寻的固定贸易成本(Fink et al., 2005)。“一带一路”倡议在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方面的举措包括海底光缆、跨境陆地光缆建设等,有望降低信息差带来的固定贸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出口门槛。

可变贸易成本即与产品数量相关的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通常被理解为“冰山”贸易成本,即类似于冰山被运过海洋,一定比例的产品在贸易过程中会“融化”(Samuelson, 1954)。最为直接的可变贸易成本即为运输成本,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欧班列、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以色列海法新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举措,切实有效

地改善了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交通状况、有助于降低产品运输成本。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与可变贸易成本密切相关,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改善出口企业融资状况促进出口(Beck, 2002)。“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一系列举措改善了出口企业融资环境,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成本。此外,贸易便利化措施也有助于缓解市场分割,加速要素流动,从而降低贸易成本(Wilson et al., 2003)。“一带一路”倡议时期,中国与多个贸易伙伴签订“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缩短了通关所需的时间与程序,降低了出口企业在海关的可变贸易成本。至此,本文提出:

假说1:“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 (二)提升文化认同

文化因素对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有学者认为文化差异会对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间规范和价值观的不同程度(Hofstede, 2001),文化差异可能使得理解、预测他人的行为变得困难,阻碍和谐和信任的发展,从而有可能阻碍国际贸易。具体地,文献中通常使用“文化距离”来量化国家间的文化差异程度。最常用的文化距离数据库(Hofstede, 2011)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性别气质、长期或短期取向和放纵或克制六个维度来计算文化距离。实证文献也对移民关系、共同的语言、历史殖民联系等其他维度的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文化差异理论认为进行文化沟通活动、提升文化认同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使用“文化摩擦”(Cultural Friction)形容文化差异对国际经济交流活动的影响(Shenkar, 2001)。文化摩擦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在互动时产生的“阻力”。文化摩擦首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果两个主体文化差异巨大但从不互动,也不会产生文化摩擦。同时,文化摩擦也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过多的文化摩擦可能会对国际经济交流产生负面影响,类似于物理学中过多的摩擦产生热量和阻力;过少的摩擦同样会带来不利的后果,类似于物理学中轮胎与道路摩擦不足会造成打滑(Shenkar, 2012)。文化摩擦理论认为国家间适度的文化交流能够促进各项国际经济交流活动。

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有学者认为应当从企业微观视角重新审视文化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杨柏等(2016)认为,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文化冲突具有多种来源,应当积极推进人才本土化并进行跨文化培训以缓解文化冲突。至此,本文提出:

假说2:“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文化认同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 四、实证模型与数据

### (一)计量模型

本文基准回归部分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使用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时间点识别“一带一路”倡议效应,评估其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在文化产品贸易额指标选取上,本文参考曲如晓等(2015)选取核心文化产品,这是因为非核心文化产品多为国际分工下的产物,难以较好地体现文化竞争力。参考Beck et al.(2010),本文将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Tradevalue_{ict} = \alpha + \beta D_{ct+2} + \delta Controls_{ct} + \mu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1)$$

在(1)式中,  $Tradevalue_{ict}$  指中国对贸易伙伴  $c$  在年份  $t$  核心文化产品  $i$  的出口额, 由于样本零值较多, 本文采取了加一再取自然对数的处理方式以保证样本容量;  $\mu_c$ 、 $\lambda_t$  分别指贸易伙伴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 以衡量贸易伙伴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本文选取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年份的滞后两期作为基年, 基年的选取考虑到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及效果可能存在的滞后性。具体滞后后期选择的原因将在政策动态影响分析部分进行进一步的阐释。感兴趣的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  $D_{ct+2}$ , 对于签署过协议的国家, 该变量在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两年及以后的年份取 1, 其他时间取 0; 对于没有签署过协议的国家, 该变量取值为 0。如卡塔尔于 2014 年 11 月签订协议, 从 2016 年开始  $D_{ct+2}$  取 1。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贸易伙伴在基年及之后年份作为处理组, 其他样本作为对照组。当系数  $\beta$  显著为正时,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varepsilon_{ict}$  为残差项。

本文控制变量  $Controls_{ct}$  包括: (1) 贸易国特征变量。包括贸易国的经济发展指数, 以贸易国的 GDP 指数、人均 GDP 指数衡量, 以上两个变量均采用 2010 年美元不变价; 科技发展指数, 以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比衡量; 国际竞争力指标, 以贸易条件 (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Index, NBTT) 衡量。值得注意的是, 衡量文化差异特征的指标通常被认为几乎不随时间变化, 最常被使用的文化距离数据库 (Hofstede, 2011) 即为截面数据。当不考虑文化距离的时间变化趋势时, 文化特征指标已在贸易伙伴固定效应  $A_c$  中得以衡量。(2) 双边特征变量。本文采用贸易开放度变量衡量贸易国经济外向程度, 并参考钱学锋、梁琦 (2008) 加入双边贸易成本变量, 以捕捉随时间变化的双边贸易阻力。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回归标准误经过贸易伙伴层面的聚类调整。

##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包含 UN Comtrade 数据库的全部国家与地区。时间选择上, 为了排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文以 2009 年作为研究区间的起点, 同时截止时间的选择是出于贸易额数据可得性、保留至少一年政策后数据的考量。数据来源包括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和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指标 (ICT) 数据库等。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 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1) 剔除无 ISO 码的国家和地区样本。通过样本筛选, 本文共得到 135450 个观测值, 包含 251 个国家或地区于 2009–2018 年向中国进口 63 种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口额数据。(2) 本文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以缓解极端值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 模型中的部分变量处理方式如下:

1. 双边贸易成本。贸易阻力可以使用双边距离变量衡量, 然而双边距离数据为截面数据, 信息被包含在固定效应当中。钱学锋、梁琦 (2008) 构建了双边贸易成本计算公式, 较好地捕捉了随时间变化的贸易阻力。本文参考该公式, 构建中国双边贸易成本公式如下, 其中  $export_j$  为中国总出口额,  $export_i$  为贸易伙伴总出口额,  $export_{ij}$  与  $export_{ji}$  为双边贸易额。其中参数  $s$ 、 $\sigma$  分别设置为 0.8 与 8 (李钢、孟丽君, 2019)。

$$\cos t_{ij} = 1 - \left[ \frac{export_{ij} \times export_{ji}}{s^2 (GDP_i - export_i)(GDP_j - export_j)} \right]^{\frac{1}{2\sigma - 2}} \quad (2)$$

2. 贸易依存度。参考许统生(2003)对经济规模修正后的公式,设置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如下,其中  $GDP_{wt}$  指世界  $t$  期 GDP。

$$open_{it} = \frac{1}{1 - GDP_{it}/GDP_{wt}} \times \frac{export_{it} + import_{it}}{GDP_{it}} \quad (3)$$

###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汇报了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是,Tradevalue<sub>ict</sub>(贸易额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的中位数为零,这意味着在贸易伙伴层面平均而言超半数的核心产品种类无贸易额,或在产品层面平均而言超半数的贸易伙伴无贸易额。尽管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较高的增速与较好的发展前景,但仍面临着现阶段总量不高、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较少的问题。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Tradevalue <sub>ict</sub>	135450	4.53	5.76	0	0	22.27
GDP <sub>ct</sub>	118062	24.12	2.24	18.83	24.02	29.33
Per Capita GDP <sub>ct</sub>	118062	8.64	1.41	5.85	8.64	11.38
NBTT <sub>ct</sub>	121464	4.78	0.31	4.00	4.76	5.59
Internet <sub>ct</sub>	114597	3.38	1.08	-0.11	3.73	4.58
cos t <sub>ct</sub>	95382	-0.52	0.17	-1.07	-0.51	-0.18
open <sub>ct</sub>	97272	-0.52	0.49	-1.78	-0.55	0.94

## 五、实证结果分析

### (一)基准回归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汇报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即,根据(1)式计量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交叉项( $D_{ct+2}$ )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Tradevalue<sub>ict</sub>)的影响,以下回归均已控制贸易伙伴与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其中第(1)列汇报了仅使用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交叉项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2)列中加入了GDP与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以缓解经济规模扩大或进口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政策外因素可能造成的遗漏变量问题。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交叉项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GDP在1%水平上正显著,表明经济规模更大的贸易伙伴倾向于更多地进口中国核心文化产品。第(3)-(4)列中本文继续加入了贸易国特征变量与双边特征变量以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交叉项分别在1%与5%水平下显著,核心结论不变。此外,第(4)列中互联网使用比例、贸易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经济越外向的贸易伙伴倾向于更多地进口中国核心文化产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被解释变量: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			
$D_{ct+2}$	0.258*** (2.95)	0.272*** (2.70)	0.361*** (2.65)	0.365** (2.18)
$GDP_{ct}$		2.447*** (3.98)	1.396*** (2.72)	1.733*** (2.96)
Per Capita $GDP_{ct}$		-1.122* (-1.92)	-0.551 (-1.01)	-0.413 (-0.74)
$NBTT_{ct}$			0.642** (2.29)	0.448 (1.14)
$Internet_{ct}$			0.287*** (2.65)	0.289** (2.14)
$cost_{ct}$				0.713 (0.50)
$open_{ct}$				0.564** (2.45)
常数项	4.517*** (1,056.84)	-44.419*** (-4.11)	-28.004*** (-3.17)	-35.945*** (-3.34)
贸易伙伴FE	Yes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135,450	115,605	101,997	83,223
$R^2$	0.331	0.284	0.277	0.235

注:所有变量符号表示经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值,下同。括号内为贸易伙伴层面聚类标准误对应的t值,\*\*\* p<0.01, \*\* p<0.05, \* p<0.1。

## (二) DID 有效性分析与内生性控制

### 1. 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动态影响

本文尝试分析与协议签署的“相对时间”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的影响,以检验政策实施前平行趋势并观察签署合作协议的动态影响。参考 Beck(2010)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Tradevalue_{ict} = \alpha + \beta_1 D_{ct}^{-9} + \beta_2 D_{ct}^{-10} + \dots + \beta_{14} D_{ct}^5 + \mu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ct} \quad (4)$$

为了更好地反映系数的经济学含义,本文选择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年份作为新的基年。其中  $D_{ct}^j (j>0)$  在 c 国基年的前 j 年取 1,其他情况下取 0;  $D_{ct}^j (j>0)$  在 c 国基年的后 j 年取 1,其他情况下取 0。为了避免完全多重共线性,回归中不包含基年项  $D_{ct}^0$ 。图 1 报告了各“相对时间”的回归系数及其 95% 置信区间(在贸易伙伴层面聚类)。基年前年份均未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测,说明政策不存在预期效应。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第三年开始,系数均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测,且系数大小随时间上升,这说明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步上升。值得说明的是,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也尝试将基年设置为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两年,基年前所有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在进行全样本平行趋势检验后,本文还绘制了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前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平均进口额增长图作为旁证。图中纵轴指签署时间不同的组别,其中从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伙伴被列示在最上方一行。结果如图 2 所示,在核心文化产品平均进口额增速方面,签署协议组与



从未签署协议组、不同年份签署协议组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均集中在0附近,初步表现了政策实施前的共同趋势。值得说明的是,图2中增速偏离均值的三个点分别为英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其中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口量占中国总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量比重较小,对整体平行趋势的影响不大。以“一带一路”倡议尚未提出的2012年为例,英国在该年对于比重为4.29%,安提瓜和巴布达当年无进口额。此外,本文也尝试剔除英国、安提瓜和巴布达样本,结果如表3(1)所示,基准回归核心结果依然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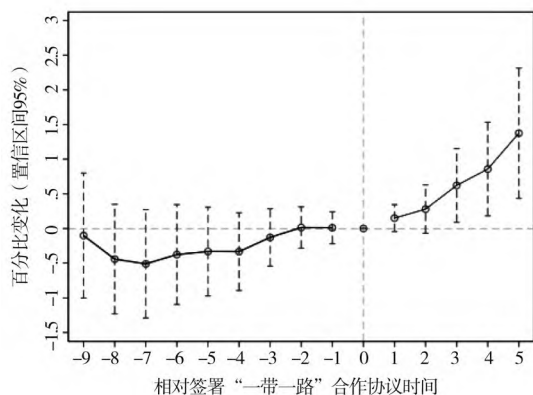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动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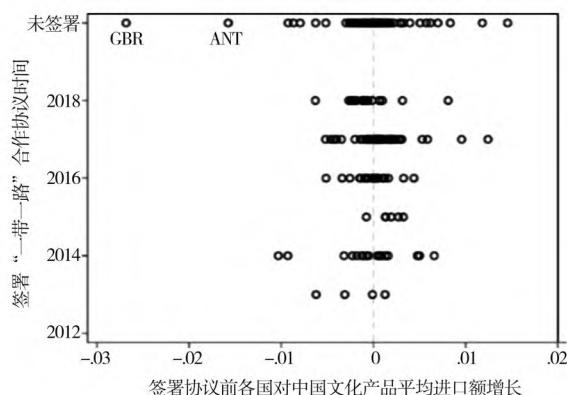


图2 “一带一路”倡议前平均进口额增长

## 2. 预期效应

参考毛其淋、许家云(2018)的研究,本文在基准回归(1)式右侧加入一项 $D_{ct+1}$ ,以检验贸易伙伴是否有预期效应。 $D_{ct+1}$ 意为取原基年的前一年(即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后一年)作为新基年,该变量对于签署过“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贸易伙伴在基年及其之后的年份取1,其他情况取0。回归结果如表3第(2)列所示,该交叉项未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样本预期效应不显著,“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签署对于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 3. 安慰剂检验

(1)假设事件时间前移。本部分安慰剂检验中,本文假设“一带一路”倡议事件发生时间前移,并对构建的交叉项变量前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作为DID方法的重要前提,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核心文化产品进口额增速不应该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事后发生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对之前的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核心文化产品进口额增速差距进行解释,故前移后的交叉项系数应当不显著。参考Topalova(2010),本文删除各贸易伙伴实际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的样本,分别构建了相对基期( $t+2$ )前移一期至前移四期( $t+1\sim t-2$ )的交叉项。结果见表3第(3)-(6)列,交叉项系数均未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不会对签署协议前的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时间层面上的安慰剂检验。

(2)随机选取处理组。本部分安慰剂检验中,参考吕越等(2019)与严兵等(2021),本文随机构建了1000组“伪处理组”,以检验是否存在国家-时间层面的遗漏变量。具体地,本文在总样本(共215个贸易伙伴)中随机抽取134个贸易伙伴作为“伪处理组”,同时随机选取“伪事件年份”,构建交叉项,回归计算出交叉项前系数的大小与对应的p值。由于“伪处理组”与“伪事件年份”选择的随机

性,若本文不存在国家-时间层面遗漏变量的假设成立,本文预期交叉项系数将集中在0附近,且不显著。将上述过程重复1000次,绘制系数-p值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显著性水平来看,1000次模拟中有11次交叉项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占比仅为1.1%,出现概率较小;从系数大小来看,1000次模拟中系数均小于基准回归中所估计的系数,这说明实际的处理组产生的效应明显偏离随机选择的伪处理组产生的效应。综上,本文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国家-时间层面的遗漏变量,本文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贸易伙伴层面上的安慰剂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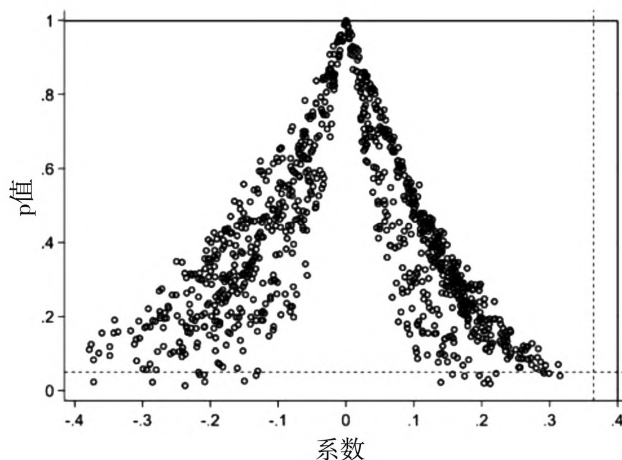


图3 随机选取处理组

####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多维固定效应。出于对现有计量理论探讨尚不充分的担忧,Baker et al.(2022)建议谨慎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考虑多维固定效应。基于此,本文基准模型部分仅考虑了贸易伙伴与时间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然而不同的产品种类出口额增长仍有可能具有不同的趋势,忽略产品种类固定效应可能会造成遗漏变量偏误。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尝试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产品层面固定效应,结果如表3(7)所示,感兴趣的变量 $D_{it+2}$ 前系数大小与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差别不大,仅模型拟合优度有所上升,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2)控制变量使用一阶滞后项。出于对于内生性的担忧,部分学者建议对控制变量进行一阶滞后处理。结果如表3(8)所示,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模型中加入是否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变量的线性时间趋势。周学仁、张越(2021)建议在模型中加入处理变量的线性时间趋势项,以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的差异。结果如表3(9)所示,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4)异质性处理效应(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Goodman-Bacon(2021)发现双向固定效应(TWFE)多期双重差分中,交叉项系数是任意两组处理组和对照组系数的加权平均值,而“坏的对对照组”会使得系数估计有偏。本文使用Borusyak et al.(2021)提出的异质性稳健的估计量,估计结果为正向显著(估计系数为0.197,p值为0.056),说明本文的基本结果稳健。

(5)控制其他双边或多边协议可能的影响。在样本研究时间段中,除了“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也有可能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控制该影响因素以缓解遗

漏变量偏误。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19个,涉及国家或地区26个<sup>①</sup>。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添加了“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以控制自由贸易协定可能的影响。结果如表3列(10)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前系数显著性与系数大小没有明显变化,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变量	被解释变量: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										
检验	分样本	预期效应	安慰剂	安慰剂	安慰剂	安慰剂	多维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使用一阶滞后项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自由贸易协定	控制地缘政治因素
$D_{ct+2}$	0.223* (2.45)	0.412* (1.93)					0.365** (2.18)	0.246* (1.91)	0.231** (2.26)	0.357** (2.13)	0.366** (2.18)
$D_{ct+1}$		0.126 (0.78)	0.164 (1.02)								
$D_{ct}$				0.113 (0.64)							
$D_{ct-1}$					0.163 (0.93)						
$D_{ct-2}$						0.272 (1.45)					
自由贸易协定										0.545 (1.36)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146 (0.78)
贸易伙伴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FE	No	No	No	No	No	No	Yes	No	No	No	No
时间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82,593	83,223	78,750	78,750	78,750	78,750	83,223	79,317	83,223	83,223	83,223
$R^2$	0.237	0.235	0.240	0.240	0.240	0.240	0.665	0.231	0.235	0.235	0.235

注:表中的回归均包含控制变量,出于篇幅考虑未报告其结果;括号内为贸易伙伴层面聚类标准误对应的t值。为了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3中除列(7)外均汇报的是未考虑产品固定效应的结果,实际上上述结果对多维固定效应依然稳健。\*\*\*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6)控制地缘政治因素可能的影响。除了“一带一路”倡议与自由贸易协定(FTA)等经济因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国家层面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可能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产生影响。根据外

<sup>①</sup> 包括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斯里兰卡、蒙古、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中国台湾、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等国家或地区。

交部数据,从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步与越南(2008年)、老挝(2009年)、柬埔寨(2010年)、缅甸(2011年)、泰国(2012年)、马来西亚(2013年)、塞内加尔(2016年)、纳米比亚(2018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政治外交关系的升级。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是否与中国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控制政治外交因素可能存在的干扰。结果如表3列(11)所示,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 (三)机制检验

文化产品具有文化与产品的双重性,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检验了以下两个机制:(1)经济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从而提升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2)文化机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通过发起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双边文化认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发声”可能有助于减少文化差异、得到贸易伙伴人民对于中国文化认同的“回响”,最终促进文化产品需求增长、提升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

#### 1. 经济机制分析:贸易成本

在指标选择上,部分学者选取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数据库中的跨境货物成本来衡量贸易成本(钱学锋,2008),但该数据库在2015年进行了统计方法的调整,前后数据不具有可比较性。参考曲如晓等(2015),本文选取The Heritage Foundation提供的经济自由度数据库来衡量贸易成本。经济自由度指数值越大,表示该贸易伙伴对于国际贸易更为友好、贸易成本更低。表4第(1)列汇报了经济自由度指数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交叉项 $D_{it+2}$ 系数正显著,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签署协议的贸易伙伴的经济自由度、降低了贸易成本,经济机制成立。

#### 2. 文化机制分析:文化认同(“发声”与“回响”)

接下来,本文具体检验了文化认同这一机制,具体通过“发声”与“回响”实现。(1)“发声”指由中国发起的与文化交流相关的国际活动,包括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设立丝绸之路欧亚文化合作组织、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展“欢乐春节”活动和建设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其中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较为广泛,能较好地识别出“发声”强度。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统计的友好城市数量数据,使用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活动作为“发声”强度的代理变量。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签署协议的贸易伙伴的友好城市数量,也即提升了“发声”强度。“一带一路”倡议后的一系列以友好城市为代表的“发声”活动有助于促进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2)“回响”指贸易伙伴对中华文化的文化兴趣强度。前文“发声”机制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影响,也即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文化交流活动、产生了文化摩擦。然而,如本文理论机制部分阐述,文化摩擦理论认为过多的文化摩擦也可能产生反向后果,或至少没有长期正向影响。同时,该增长效应可能仅仅来源于“文化输出”,而未必真正通过增进双边文化认同以提升贸易伙伴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入境外国旅客人数数据作为文化兴趣强度的代理变量,并通过限定入境目的为观光休闲以排除商务访问等经济因素影响,以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贸易伙伴文化兴趣强度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交叉项 $D_{it+2}$ 系数正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提高了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文化兴趣强度,实现了恰当的文化摩擦,真正实现了“民心相通”。



综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同时通过经济机制与文化机制实现。其中经济机制具体体现为贸易成本的降低,文化机制具体体现为中国发起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环境中“发声”与贸易伙伴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强度上升的“回响”。

#### (四)异质性检验

本部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种类核心文化产品、不同贸易伙伴的异质性影响。

##### 1.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异质性

核心文化产品可以被分为文化消费品与文化收藏品。其中文化消费品包括视觉艺术品、印刷品与“其他”三大类,具体包含图书、报纸、雕像装饰品、刺绣艺术品、书法用品和乐器等;文化收藏品包括声像制品、文化遗产与视听媒介,具体包含磁带、唱片、超过一百年的古物、考古学收藏品和胶片等。

本文根据HS码匹配结果对核心文化产品进行分组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5左栏中文化消费品的三个子类交叉项 $D_{ct+2}$ 系数均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消费品的各种类都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右栏中文化收藏品的三个子类交叉项 $D_{ct+2}$ 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收藏品的各种类均没有显著影响。也即,“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增长书籍、装饰品等文化消费品的出口来促进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而对古物、唱片等文化收藏品影响较小。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经济机制(贸易成本)	文化机制(文化认同)	
	经济自由度指数	友好城市数(“发声”)	旅游人数(“回响”)
	(1)	(2)	(3)
$D_{ct+2}$	0.019** (2.19)	0.145** (2.26)	0.050*** (3.17)
$GDP_{ct}$	-0.032 (-0.53)	-0.509* (-1.68)	0.082 (0.97)
Per Capita $GDP_{ct}$	0.189*** (3.48)	1.062*** (2.95)	-0.056 (-0.74)
$NBTT_{ct}$	0.011 (0.53)	0.031 (0.32)	0.021 (0.60)
$Internet_{ct}$	0.002 (0.32)	-0.010 (-0.27)	0.057*** (2.88)
$cos t_{ct}$	-0.015 (-0.32)	-0.265 (-0.86)	0.086 (1.21)
$open_{ct}$	-0.000 (-0.00)	-0.003 (-0.04)	0.034 (1.62)
常数项	3.184*** (2.73)	4.474 (0.83)	-1.411 (-0.89)
贸易伙伴FE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样本数	73395	83223	83223
$R^2$	0.954	0.984	0.995

注:括号内为贸易伙伴层面聚类标准误对应的t值,\*\*\*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表5 不同种类核心文化产品异质性结果

	(1)	(2)	(3)	(4)	(5)	(6)
大类	文化消费品			文化收藏品		
类别	视觉艺术品	印刷品	其他	声像制品	文化遗产	视听媒介
$D_{ct+2}$	0.427** (1.98)	0.404** (2.04)	0.457* (1.85)	-0.084 (-0.40)	0.287 (1.55)	0.237 (1.46)
贸易伙伴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26420	21136	18494	6605	2642	7926
$R^2$	0.707	0.707	0.686	0.552	0.306	0.454

注：“其他”包括宣纸、毛笔和乐器等。\*\*\*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 2. 不同贸易伙伴特征的异质性

如前文所述,以往的众多研究均针对地理位置对贸易伙伴国进行分类,而本文不限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与是否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将不同时期所有签署合作协议的贸易伙伴、地区和组织均纳入研究范围。

然而,地理位置语境下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sup>①</sup>确实可能会受历史通商因素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此,本文建立三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是否为地理位置语境下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受到的异质性影响。虚拟变量  $feature_c$  取1代表贸易伙伴  $c$  是地理位置语境下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取0代表非地理沿线贸易伙伴。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三重差分项  $D_{ct+2} \times feature_c$  不显著,也即“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对历史通商因素没有异质性。此外,本文也对贸易伙伴是否是内陆国或内陆地区、贸易伙伴发展程度是否为发达程度、是否是贸易规模大于中位数的贸易伙伴这三个特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6第(2)-(4)列所示。其中第(2)列为是否是内陆国或内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三重交叉项  $D_{ct+2} \times feature_c$  前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在内陆国或内陆地区相对明显。第(3)列为是否为发达贸易伙伴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三重交叉项  $D_{ct+2} \times feature_c$  前系数不显著,说明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会显著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促进效应的大小,也即“一带一路”倡议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中具有相似的核心文化产品促进效应。第(4)列为是否是贸易规模大于中位数的贸易伙伴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三重交叉项  $D_{ct+2} \times feature_c$  前系数不显著,结果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促进效应的大小与签订协议前的贸易规模没有显著的关联。

<sup>①</sup> 此处“地理位置语境下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指:巴林、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缅甸、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阿联酋、越南、也门、马尔代夫、卡塔尔、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尼泊尔、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不丹、巴勒斯坦。

表6 不同贸易伙伴特质的异质性检验结果<sup>①</sup>

	(1)	(2)	(3)	(4)
	地理位置沿线	内陆国或内陆地区	发达贸易伙伴	贸易规模大于中位数
$D_{et+2} \times \text{feature}_e$	0.139 (0.69)	0.459*** (3.22)	-0.003 (-0.02)	-0.168 (-1.05)
$D_{et+2}$	0.232 (1.19)	0.173 (0.98)	0.368** (2.15)	0.467** (2.34)
贸易伙伴FE	Yes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83223	83223	83223	83223
R <sup>2</sup>	0.235	0.235	0.235	0.235

注:\*\*\* p<0.01, \*\* p<0.05, \* p<0.1。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的重要话题之一,文化产品正是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使者。本文使用2009—2018年UN Comtrade数据,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核心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有着正向显著的影响,该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预期效应与安慰剂检验。通过机制分析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同时通过经济机制与文化机制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产生影响。本文也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异质性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消费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首先,打造文化产品产业园区,推动文化产业生产端高质量发展。逐步提升文化产品产业园区的基础建设水平,优化金融支持,加强政策扶持,提升文化产品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其次,稳步提升中欧班列等境内外货运能力,保障文化产品物流链稳定畅通。优化运营程序,提升通关效率,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最后,主动融入国际文化交流体系,积极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产品需求稳健增长。例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建设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以文化交流促“民心相通”,以“民心相通”促共同发展。

### 参考文献

- 范兆斌、黄淑娟,2017,“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贸易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分析”,《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第125—140页。
- 方慧、赵甜,2017,“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管理世界》,第7期,第17—23页。
- 蒋冠宏,2017,“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19—136页。

<sup>①</sup>表6中“一带一路”倡议变量前系数可以解释为:对贸易伙伴特征变量取0的样本,“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列(1)和列(2)该系数不显著,意为对于地理位置不处于“一带一路”沿线或地理位置沿海的贸易伙伴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心文化产品的促进效应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样本(位于“一带一路”沿路或地理位置为内陆)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实际上,该效应的大小等于“一带一路”倡议变量与三重交叉项系数之和。F检验显示对于位于“一带一路”沿路或地理位置为内陆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

- 李兵、颜晓晨,2018,“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公共安全的视角”,《经济研究》,第1期,第183-197页。
- 李钢、孟丽君,2019,“舆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美国进口贸易为例”,《世界经济》,第8期,第146-169页。
- 李建军、李俊成,2020,“‘一带一路’倡议、企业信贷融资增进效应与异质性”,《世界经济》,第2期,第3-24页。
- 李敬、陈旒、万广华、陈澍,201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基于网络分析方法”,《管理世界》,第4期,第10-19页。
- 卢盛峰、董如玉、叶初升,2021,“‘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80-98页。
- 吕越、陆毅、吴嵩博、王勇,2019,“‘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经济研究》,第9期,第187-202页。
- 毛其淋、许家云,2018,“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管理世界》,第5期,第10-27页。
- 钱学锋、梁琦,2008,“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2期,第53-62页。
- 钱学锋,2008,“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管理世界》,第9期,第48-56页。
- 邱雪情、卓乘风、毛艳华,2021,“‘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南方经济》,第6期,第20-35页。
- 曲如晓、杨修、刘杨,2015,“文化差异、贸易成本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世界经济》,第9期,第130-143页。
- 施炳展,2016,“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第5期,第78-97页。
- 孙楚仁、张楠、刘雅莹,2017,“‘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第83-96页。
- 王桂军、卢潇潇,2019,“‘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43-61页。
- 王建平,2014,“‘走出去’战略对我国文化产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第178-179页。
- 王雄元、卜落凡,2019,“国际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80-98页。
- 韦永贵、张艺川,2021,“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友好城市的研究视角”,《南方经济》,第11期,第97-121页。
- 徐梁,2016,“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管理世界》,第2期,第170-171页。
- 徐思、何晓怡、钟凯,2019,“‘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融资约束”,《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第155-173页。
- 许统生,2003,“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经济学动态》,第8期,第17-20页。
- 严兵、谢心荻、张禹,2021,“境外经贸合作区贸易效应评估——基于东道国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第119-136页。
- 杨柏、陈伟、林川、宋璐,2016,“‘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冲突策略分析”,《管理世界》,第9期,第174-175页。
- 杨连星、刘晓光、张杰,2016,“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第56-72页。
- 姚星、蒲岳、吴钢、王博、王磊,2019,“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融合程度及地位:行业比较、地区差异及关联因素”,《经济研究》,第9期,第172-186页。
- 岳云嵩、李兵、李柔,2016,“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第131-141页。
- 张会清、唐海燕,201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联系问题研究——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第3期,第27-40页。
- 张述存,2017,“‘一带一路’倡议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管理世界》,第4期,第1-9页。
- 周学仁、张越,2021,“国际运输通道与中国进出口增长——来自中欧班列的证据”,《管理世界》,第4期,第52-63页。
- Baker, A. C., Larcker, D. F., and Wang, C. C., 2022,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es?”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4(2): 370–395.
- Beck, T., 2002,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re a Lin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7(1): 107–131.
- Beck, T., Levine, R. and Levkov, A., 2010,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5: 1637–1667.
- Borusyak, K., Jaravel, X. and Spiess, J., 2021, “Revisiting Event Study Designs: Robust and Efficient Estim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 2108.12419.
- Disdier, A. C., Tai, S. H., Fontagné, L. and Mayer, T., 2010, “Bilateral Trade of Cultural Good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5(4): 575–595.
- Dong, C. V. and Truong, H. Q., 2020, “The Determinants of Creative Goods Exports: Evidence from Vietnam”,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44(2): 281–308.
- Ferreira, F. and Waldfogel, J., 2013, “Pop Internationalism: Has Half a Century of World Music Trade Displaced Local Cult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3(569): 634–664.
- Fink, C., Mattoo, A. and Neagu, I. C., 2005,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Cos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7(2): 428–445.
- Footer, M. E. and Graber, C. B., 200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ultural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1): 115–144.
- Francois, P. and Van Ypersele, T., 2002,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Goo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6(2): 359–369.
- Galperin, H., 1999, “Cultural Industries Policy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e Cases of NAFT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ERCOSUR”,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1(5): 627–648.
- Goodman-Bacon, A., 2021,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 254–277.
- Hahn, M., 2006, “A Clash of Cultures? the UNESCO Diversity Con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9(3): 515–552.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Hofstede, G., 2011, “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 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1): 2307–0919.
- Li, C. and Yang, L., 2020, “Import to Invest: Impact of Cultural Goods o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93: 354–364.
- Liu, W. and Dunford, M., 2016,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Unpack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1(3): 323–340.
- Marvasti, A., 1994,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ltural Good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8(2): 135–148.
- Matheny III, R. L., 1998, “In the Wake of the Flood: Like Products and Cultural Products Af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Decision in Canada 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cals”, *U. Pa. L. Rev.*, 147: 245.
-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 Obstfeld, M. and Rogoff, K., 2000,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5: 339–390.
- Samuelson, P. A., 1954,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II: 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64(254): 264–289.
- Shenkar, O., 2001, “Cultural Distance Revisited: Towards a More Rigorou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2(3): 519–535.

Shenkar, O., 2012, “Beyond Cultural Distance: Switching to a Friction Le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1): 12–17.

Tadesse, B. and White, R., 2010, “Cultural Distance as a Determinant of Bilateral Trade Flows: Do Immigrants Counter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7(2): 147–152.

Topalova, P., 2010,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4): 1–41.

White, R. and Tadesse, B., 2008, “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US Immigrant–Trade Link”, World Economy, 31(8): 1078–1096.

Wilson, J. S., Mann, C. L. and Otsuki, T., 2003,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3): 367–389.

## The Impact of the B&R Initiative on the Export of Cultural Goods :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aggered DID Model

Liu Bin   Zou Tianhua   Zhang han

**Abstract:**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B&R initiative on the export of cultural goods using the staggered DID model. Exploiting the cross–partner, cross–time variation in the timing of the B&R initiative, we find that the B&R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export of cultural goods by reducing trade costs and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Furthermore, the impact mainly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e of consumer goods export instead of art collection export.

**Keywords:** B&R Initiative; Cultural Goods; Staggered DID

(责任编辑:徐久香)